

第6卷第2期 2013年6月

Vol. 6, No. 2, June, 2013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高等教育扩张会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吗?	43
大学品牌化的趋势和策略.....	45
欧洲: 宗教信仰与高等教育成就.....	47
想象大学	49

营利性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利益动机	51
挤压非营利部门	54
“质量—利润”假设	57

高等教育国际化

美国的国际学生流动	59
中国的孔子学院——更学术化、更综合性.....	62
加拿大终于制定了国际化的政策.....	64
海外分校在初创时期的战略选择.....	66

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绽放新活力.....	68
阿根廷的公立大学: 既无效率又无效果?	71
中美洲: 国际学术合作的价值.....	73
墨西哥: 入学竞争、院校评鉴、私立—公立大学市场.....	76

新书速递	78
------------	----

高等教育扩张会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吗？

Martin Carnoy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学专业教席

电子邮箱: carnoy@stanford.edu

人们对于扩大入学机会的好处广泛持有这样一个信念：扩大入学机会将增加社会流动性，促进收入公平。对高等教育而言，随着入学人数的扩大，来自低收入家庭的聪明青年更容易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通过让他们拥有更高的学位以竞争高薪工作，理论上讲应该会增加他们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同时，随着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他们的相对收益可能会下降，这将最终使得整体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但现实却恰与这种信念相反。在很多中等教育毕业生和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正快速增长的国家，收入分配却正变得更加不平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流动也处于停滞状态。

最近，一群国际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了解教育扩张是否会促进收入平等。这项研究关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合称为“金砖四国”）的情况。金砖四国拥有全世界40%的人口，在过去的15年里，它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显著提高。

为收入变化建模

经济学家过去曾为收入变化建模，函数的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方差、学校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以及不同学校教育水平回报率的方差。经济学家们常常假设，随着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增加到相当高的水平，学校教育的回报就会下

降，受教育年限的方差也将下降。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因为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理论和学校教育的扩张速度大于雇主需求的事实都支撑了这一假设。

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观察到，即使教育系统扩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快速增长，大学毕业生的回报却不会下降，相对于中学毕业生的回报甚至还会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存在许多种解释。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可以代替低素质劳动力，因此而压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工资。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保持相对恒定，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那样，中学毕业生的工资则趋于下降，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拥挤”。第二种可能的解释认为，生产和服务需要的知识强度在提高，因此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需求增速快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速度。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偏向于高收入人口，反对工会的政策也增加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收入压力。这样的政策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我们的研究发现

不论采用何种解释，尽管四个被研究国家的高等教育快速扩张，但大学毕业生的回报在过去的十年里却似乎倾向于增加（而不是下降），相对于中等教育的回报也在增加。这也提高了不同受教育水平群体收入的离散

程度。合在一起，这些“回报效应”导致收入更加不平等，也倾向于抵消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受教育年限方差的减少带来的均衡效应。

因此，对金砖四国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高等教育的扩张和教育回报率的相关变化似乎维持或扩大了收入不平等。在巴西，教育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影响了收入分配：受教育年限回报率方差的增加乘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然而与该趋势相反，在巴西，教育平均收益的下降加上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方差的增加，则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在中国，教育回报率和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尤其导致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在印度，不平等可能加大了，原因在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以外的因素。最后，在俄罗斯，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很小，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似乎也很小。俄罗斯和印度一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变化可能是由于其他未被注意到的因素。

面对更多的总收入再分配政策，还有另外两个可能导致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也让巴西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了原有水平。第一个因素是用在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上的开支的分化加剧，包括巴西、中国和俄罗斯

（印度不明显）。在过去的5~10年里，精英学校的生均支出增加了，而普通学校的生均教育支出则可能有所下降。由于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学生更有可能占据精英学校的多数，他们不成比例地受益于这种分化。

第二个因素是高等教育占公共支出的总体比例。这一公共支出向来自高收入家庭（最高的20%）的学生严重倾斜，比如在巴西这样的国家，75%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大学，不受政府补贴。在巴西、中国、印度甚至俄罗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这些学生受到大量的政府补贴。

因此，金砖四国高等教育的巨大扩张并没有有效的促进收入分配平等。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如果没有直接针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强大的财政和社会支出政策出台，收入不平等将继续保持在高水平，甚至可能会加剧。

作者注：与本文相关的书籍《全球经济变革中的大学扩张：金砖四国的胜利？》（*University Expansion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Triumph of the BRICs?*）将于2013年6月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学品牌化的趋势和策略

Gili S. Drori

以色列耶路撒冷市希伯来大学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社会学和人类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gili.drori@mail.huji.ac.il

全球对资源、生源、师资的激烈竞争态势正推动全世界的大学不断开展战略建设和品牌计划等活动。与公司相同,大学也明确指出他们的愿景和使命,以此形成品牌差异并开展营销活动。该发展趋势的影响之一是,在营销和品牌顾问的指导下,世界各地的大学以个性化的、吸引眼球的标识取代了传统的徽章。这完全意味着大学从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通常是公立的)机构转型为市场参与者。

品牌化趋势

品牌是人工产品,是组织独特的身份标识,用于传达特定大学的个性特色。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中,产品向消费者寻求关注,品牌化被认为是市场营销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个逻辑渗透到大学的全球化中:虽然大学一直自豪地团结在他们的徽章背后,将它们视为大学社区的象征,然而学术品牌化还是与营销策略联合在一起,旨在将大学和其它与之竞争的(约)14 000所大学区分开来。

大学的品牌化有三个趋势。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大学都改变了他们的标志或象征:传统的象征承载着专业符号,它们被改造为标志,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商业品牌。很明显,这是大学标识的美学变化:从一个装有比喻形象(一本书,一个象征着启蒙精神的光源,或国家标志)和有意义的文本(如大学的名称和它的创始年份)的象征,

到一个“嗖”的形象——模模糊糊的让人联想起大学历史(其创始人)、使命(实验室工具或打开的书)或特色(自然环境、校园生活、运动等)。这些重新设计的标识简约但不失低调的华丽,它们代表了新大学或正在进行战略规划建设的大学的特征。因此,采用标识标志着大学以目前合法的可视化表现形式向公司看齐,创建一个能够快速被识别并适合营销的组织形象。

第二种趋势是,大学是在传统标识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不是去取代传统的象征。在这种趋势下,这些新的图标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如大学印章仍然广泛用于大学文凭等官方文件。相比之下,标识则用于横幅、Web 页面的数字标记,而文字标志(一个简化的大学徽章和大学名字)则用于纪念品和名片。这是一种不同身份的视觉表达,因受众和功能而不同。例如,大学几乎完全依赖他们的标识以吸引年轻的潜在学生,同时在正式的事件如毕业典礼上保留其传统的象征。

最后一种趋势是,大学为他们的图标和校训申请专利,将它们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起来,注册为商标或服务标记。一旦被注册,大学标志就通过营销成为收入来源。大学为制造商提供授权,让他们生产和销售知名大学的运动衫和T恤衫。这种对专有标志的专利保护是基于价值定位:大学图标不再仅仅是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社区的身份标志,它们

已经成为影响大学声誉的商品。

战略意义

既然品牌化被认为势在必行，并且大学推出了品牌宣传活动，那么大学就转而向专业人员寻求指导。事实上，大学品牌成为了品牌和营销咨询公司的一项专业：咨询公司为大学提供专业的品牌和营销服务，品牌联盟也在大学校园建立了分会。这种专业化还驱动了大学的管理变革，往往促成一个负责品牌管理的行政单位的诞生，或大学发言人定位的改变，使其从纯粹的大学活动信息发布转变为大学向潜在的学生和家长、捐赠者、合伙公司的主动营销。

一旦一个品牌运动确立了全新风格的图标或图标的集合，必然伴随大学运营上的调整。通常，大学会将品牌指导方针变成规章：许多大学制定了《品牌手册》来指定标识的颜色和尺寸，描述各种图标和它们的功能角色，对品牌使用进行法律说明。同样，任何偏离或侵犯这些规章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大学对那些侵占该标识所有权声明的其他机构提起诉讼，一些大学还惩罚了大学内部不遵循指导方针的院系。这些管理行为被正式解释为建立大学整体形象的重要措施，但这些解释也被大量灌输了有关组织单位之间行政凝聚力的管理理念。

文化内涵

品牌化不仅是纯粹的时尚，即大学向公司和其他成功的大学学习市场营销；相反，品牌化是大学身份的一个有意义的改变。大学的标识很少将学术表达为一个职业、将大学自身表达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或知识组

织。此外，标识很少能够传达大学的遗产或地理位置等信息。因此，改变标识也是一个蜕变：抛弃传达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质的专业机构的标识，代之以那些具有品牌的商业识别力和价值的标识。事实上，品牌是创业型大学以及商品化、市场化相关流程的一个衍生物，即创业型、社会参与型的大学正在通过专利进行营销，同时也正通过品牌营销自己的声誉。

品牌为形成已久的学术分类引入了新的内涵。品牌为大学带来了市场逻辑和管理主义，提高了学术竞争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大学变成了一个“促销大学”。促销和营销即使改变的并非核心，也改变了学术工作的基调：从品牌的角度来看，追求卓越是一个差异化策略，而不只是一种专业责任。对促销的强调也伴随着对大学所作所为的重新定义，使知识创造、教学、研究屈从于营销和服务的逻辑。具体地说，因为品牌声誉建立在客户服务和产品功用之上，大学变得特别专注于学生对于教学和毕业工资福利的评价，随之课程决策（如开一门特定的课程或开一个新的专业）也需取决于学生的满意度。例如，一门课程是否得以开设可能取决于其受欢迎的程度和注册率，而不是取决于该课程对整个专业发展和知识获取路径的意义。最后，品牌重新定义了学术职业：通过允许顾问指导策略，教师将大学管理的责任委托给“局外人”，将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自治交给职业经理人。这样，大学从具有行会性质的机构变成了一个现代组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暗示了“品牌社会”已渗入到学术界及大学中去。

欧洲：宗教信仰与高等教育成就

Gaële Goastellec

瑞士洛桑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ausanne)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Gaele.Goastellec@unil.ch

虽然宗教在历史上一直都是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维度，但几乎没有研究探寻当代的宗教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分析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它可以帮理解高等教育在一个特定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宗教环境或多或少促使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这些环境比较中学到什么？第二，此类分析考虑了宗教背景和相关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在历史上，由于宗教原因，一些群体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欧洲社会今天仍然或多或少受到宗教影响。这要求我们将宗教作为一个潜在的不平等指标，与民族社会经济背景因素一起来考虑。

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本研究使用了“欧洲社会调查”(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的数据。从五次调查(2001~2010)中，我们获得了一个含有181 492人次的样本，他们出生于1939~1979年间，来自30个欧洲国家。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原创性的研究设计，将高等学位持有者与其余的人口进行比较，看他们的宗教背景。

宗教信仰、教育和社会

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一个全球趋势：在欧洲，大多数世俗社会拥有更高层次的教育。比较两组社会，我们看到，最世俗的社会拥有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而最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教育水平则较低。另一个趋势

是：与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相比，具有新教传统的国家更可能拥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如何解释这些趋势？部分研究表明，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认定，新教教义不仅产生了高度的经济繁荣；并且，阅读《圣经》需要具有高水平的读写能力和教育。事实上，基于新教和天主教的历史，人们会发现这些宗教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区别：在新教中，个人和知识的关系是直接的，《圣经》很早就被翻译成德语(相反，拉丁语在天主教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学校教育的发展在宗教改革中得到支持。所以，今天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差异可以解释为，或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历史选择的结果。这样，选择一种常用语言开展宗教教育，使新教的阶级层级结构比天主教更为简单。这与事实相吻合，在1900年，新教主导的国家识字率高于天主教主导的国家。

这表明宗教机构的一个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教育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同时，也要求我们发展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方法，探索高等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复杂联系。

宗教信仰、教育和个人

第二个重要结果关注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宗教背景对个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调查了宗教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在每个国家的调查中，我们对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父母及受访者出生国家、国籍、民族或族群以及家庭语言等因素进行了控制。一旦这些变量被控制，宗教还会产生影响吗？

首先，在那些大多数受访者声称具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个人似乎更倾向于持有高等学位。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波兰、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其大部分人口信仰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宣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比那些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有可能持有高等学位。希腊和俄罗斯也是这样，这两个国家的人大多数信仰东正教。

第二，在那些大多数受访者声称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中，确认自己具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更可能持有高等教育学位。例如，英国、瑞典、比利时的天主教徒，以及英国、瑞典和拉脱维亚的新教徒们。

第三，不同民族之间相比，至少五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希腊、瑞士）

的穆斯林教徒和瑞士的东正教徒似乎较少持有高等学位。此外，不同年龄段的人口相比，持有高等教育学位的宗教信徒的特征也有所差别。这意味着宗教信仰对人们的影响随时间而变化。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指标

那么，为什么考量宗教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关系呢？先前强调的趋势显然很难解释，因为它们是复杂和模糊过程的产物。不过，似乎至少有三个理由支持开展深入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厘清宗教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多重因果关系有助于理解高等教育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在实践层面上，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是怎样和个人的教育轨迹相互交织的机会。高等教育在建立民族国家、整合多元化宗教社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最后，研究不限制地将教育不平等与社会经济和种族背景因素联系起来分析，而且还将之与个人的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分析。

想象大学

Ronald Barnett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高等教育荣休教授

电子邮箱: R.Barnett@ioe.ac.uk

《国际高等教育》见证和如实记录了世界各地大学的持续变化,并在不同背景下对这些变化开展世界性的对话。

这些反思引出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由于对话可以跨国开展,这表明正在发生的变革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这些变革已经在过去的30年里得到确认,包括全球知识经济、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这些名词的兴起。最近,认知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等术语也被提出。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使公众的、互动的和多通道的知识活动成为可能。

受到全球力量的影响,人们见证了创业型大学的兴起。这类大学相信它们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提供社会服务和相关产品,这些服务和产品与知识形成和传播紧密相连,在市场上具备交换价值。这种大学已经从位于社会边缘的小机构转变成为影响世界认知的重要机构。

反响

这些现象产生了来自不同人群的普遍反响。首先是那些设计了创业型大学理念的人。他们在政治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包括大学的高级管理层和领导层,政府机构,独立顾问,以及智库。第二是学术评论家,他们沿着批判的脉络,信奉着新自由主义、表演性、学术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的语言。第三是一群批判大学落后于时代的评论家。他们指出无围墙大学、无边界大学和合作大学的出

现是一种机遇。在这个概念下,大学总是反应很慢,很晚才抓住发展机遇。

最后,是那些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们在阐述对大学的观点时,常常倾向于抽象层面。在评价大学时,他们不提供具体建议,而是关注那些大学需要满足的交流环境。一所有分歧的大学、一个理想的情景或(更含糊)任何一所大学都可能会作为一类典型案例拿出来说明。

想象力的形式

将以上整个争论描述为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活动是非常容易的,但并不公平。相反,正如我们观察的那样显而易见,想象大学的形式多种多样,并被放大在(有时模糊的)学术文献中。

关于想象力形式的争论可分为乐观与悲观、表层与深层两种。那些赞成创业型大学的人持乐观观点,而那些赞成标准学术批评的人则很悲观(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前状态显然已达到最佳状态)。有一些想象则停留在表面层面(不加鉴别地谈论质量、卓越和技术),而其他则试图挖掘影响大学的深层次全球结构。同样,如上所述,一些想象力的形式默默推动着大学运行的方式,而另一些人却力图批判它。

想象力的匮乏

然而,事实证明,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

并不缺乏想象力，即使不是思想的海啸，也已经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涌流。其中，有两个重要的观点。

首先，学术界几乎没有能进入公共视野的大学理念。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的理念不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情绪。这种情绪视公共服务物有所值，由顾客承担成本，因此也相信一个企业的价值表现为购买者的存在。因此，一个话语政权便自然产生，即创业型大学。即使它成为大学城唯一的游戏也并不令人惊讶。

另一个可以用来解释公共领域缺乏思想的原因：学术文献中的那些想法可能并不值得广泛传播。毕竟，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大学理念不一定是一个好理念。因此，我们不缺乏大学理念，而是更好的理念。

第二，尽管我们有丰富的思想，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谈及某种程度的想象力贫乏。总的来说，大学的理念必需在语气上具有批判性，在精神上具有积极性，并具有深刻的、全球结构的意识。如前所述，大部分的学术文献过度悲观：即使我们有诸多不利因素，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立即对情况现实起来，同时保持乐观的态度，提出富有想象力的理念呢？我们所需要的当然不仅仅是乌托邦的大学，而是可行的乌托邦。

一个可以付诸实践的乌托邦？

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可行的乌托邦，即生

态大学。生态大学错综复杂，与全球知识经济、市场化和竞争力量有很深的纠缠。但它会寻找空间，展示出深深植根于大学的价值和思想——真实忠诚、分析研究、批评对话、理性争辩，甚至是打破旧习的努力。生态大学也会对不同的生态系统产生敏感意识，如知识、文化、制度和经济；大学也会对各个层次的生态产生敏感意识，从在社区服务的个人到整个世界本身。此外，尽管生态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生态大学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该理念（维持学生，或社会，甚至世界的发展），但会促进每个层面的健康发展。

结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敦促对大学的思考应具备更多的想象力，甚至是提供可行的乌托邦的想象力。此处建议的生态大学不过是一个脉络。然而，一个想将自己视为生态大学的学校，需要富有想象力。为了完成发展成生态大学的任务，需要一起进行想象活动。因此，大学领导的表现之一则为鼓励和组织集体一起进行想象活动，这样一个大学可以在每项活动中实现其每个可能。这反过来要求我们必须必须在大学中开放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视野。

注：本文作者的新书名为《想象大学》，2013年由Routledge出版。

高等教育的利益动机

Andrés Bernasconi

智利天主教大学教育学院 (th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abernasconi@uc.cl

去年智利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谴责教育对利润的追求。示威者和民意调查中的绝大多数公众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通过教育寻求经济收益在道德上是非法的，应该立法禁止。大多数人似乎相信，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产业化。

学生们的抱怨受到了关注。智利的中小学教育机构和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按照营利性公司运营。只有大学被要求作为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然而，这条规则被很多大学（可能其中大部分是该国的私立大学）避开了。私立学校、大学旗下的企业及其所有者保持聪明的三角关系，旨在为大学的创建者或所有者赚钱。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大学在技术上满足学生的要求更容易，因为只需要把书上列出的法律实施就行了。而在教育的其他层面上，政府可能需要剥夺当前营利性教育提供者所经营的合法业务，这是一个宪法困境，也可预见其将成为律师开展法律争论的天堂。

在政治上，改变现状涉及到相对失败的右翼联合政府，该政府站在投资者的角度，高度重视私立教育、自由企业，以及游戏规则的稳定性的。

这对智利以外的国家也有思考价值，也就是说：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好处和坏处到底有哪些？高等教育可以产业化吗？这是一项必要的商业业务吗？

逐利商家的公平游戏？

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一直分成公立、私立—慈善、宗教附属机构三种。但营利性教育提供者的数量正在增长，不仅在美国，拉丁美洲亦是如此。例如，据估计，巴西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注册学生总人数中营利性部门占据的比例超过30%。但巴西、秘鲁或哥斯达黎加等国都允许高等教育营利。此外，全球也许有几百万学生表面上进入的是非营利大学，然而学校的控制者却通过暗中交易无视营利禁令。

为什么教育不应该有经济收益呢？有一种观点强调了以信托为基础的教育关系的本质。如果教育的主导目标不是教育人而是赚人的钱，这一构想就会被颠覆。那些接受教育的人可能会问自己：学校实际上是在对教育进行投资还是在走捷径实现收益最大化。相反的一种观点是，教育产业要发展，就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否则，人们就会把他们的投入转移到别处。这种绩效压力，即使不存在任何良性的内生动机，也创造了外生的良性影响。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有益的竞争效果，就像任何其他市场一样，消费者需要了解高质量的绩效信息。

现在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美国、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营利性大学，学生集中就读于少数几个大型教育机构，这可能是管理、教学设计和教学的规模经济造成的：营

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显然比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更适于大型机构（或集团）的形成。这个现象是好是坏取决于人们的立场是支持市场集中还是市场分散。

教育产业化的支持者常常推崇利润最大化带来的效率。如果企业的目的是为所有者获取经济收益，就必须控制资源浪费问题、缩短停工时间、谨慎投资，并精心设计激励措施，让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出最好的表现。这些措施会让客户受惠，但通常这些都不会在非营利机构和公共机构发生。此外，人们认为，与结构复杂的基金会或其他私立或非营利性慈善机构相比，营利性大学的法律结构可能更适合现今残酷的高等教育竞争环境。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也注意到一个趋势：营利性组织形式在管理和资金筹措上有更大的便利，他们的所有者通过公募或贷款取得经费，投资到教育设施上。这对非营利组织来说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要实施起来就没那么频繁和容易了。

对质量的影响

然而，这种安排产生了一些实际问题，不仅仅是公立学校和非营利学校是否效率较低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营利性机构较慈善或公立学校所获的效率优势是否大于收入份额（即支付给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薪资），因而无法再投入教育。换句话说，就剩下的、可再投入高质量教育的资源来看，追求营利会造成何种影响？反对者还强调，组织机制、个人奖励和效率最大化的整体文化对学术诚信有害：不考虑质量，如果学生太少不能做到收支平衡，人文领域一些人数不足的专业可能会被关闭。同时，大班可能会对商业有益，但对师生交流有害；昂贵的师资可能会被较低成本的次等教师所取代。

除了质量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与那些能够自由地将收入花在教育需求上的非营利性机构相比，一个给股东分红的营利机构可以提供质量更好的教育吗（此处将质量定义为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这是营利性机构价值承诺中最重要的一点）？实际问题是，营利性机构的效率相比于其支付给股东的分红而言，究竟有多大。拉丁美洲的观察人士认为，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大学在被国际教育公司收购之后有所改进。而在毕业生测试上领先于世界的巴西，正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对各个专业毕业生的测试项目，该测试项目所获得的数据可用于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对不同类型学校学生所获平均分的初步分析呈现出混合、不确定的结果。

营利性高等教育是必要的吗？

即使高等教育的营利目的带来的缺点比优点多，但营利性高等教育可能仍然是“必要之恶”。在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公共部门增长的时期，它们能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此外，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慈善事业稀缺的情况。实际上，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营利性活动，在发展中国家似乎比在工业化国家更为普遍。有人认为，如果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没有产业化，那么他们的高等教育体制根本建不起来。然而，实情是否如此还要准确分辨什么是营利性、什么是非营利性——而这在目前信息缺失的环境下很难判定。

最后，为什么要禁止人们选择营利性教育提供者呢？不管答案是什么，没人能否定“信息”的必要性。顾客们必须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大学是否是营利性大学以及各类公共财物情况汇总，无论学校的经营模式如何，这些信息都应该能够方便获得。但是全世界

对营利性大学犹豫的态度应该让我们冷静下来思考社会中教育产业的社会合法性。

挤压非营利部门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特聘教授兼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PHE) 主任

电子邮箱: dlevy@albany.edu

世界高等教育通常被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 但后者同时包含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机构。正如医院、儿童设施和监狱一样, 我们也可以将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公立院校、非营利性院校和营利性院校。

私立院校: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然而, 不论将私立高等教育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个子类, 还是将这两个子类独立出来, 一个明显的、令人惊异的事实是: 尽管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正在增长, 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却正受到挤压——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占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份额几十年来不断增长, 现在却受到严重威胁。而这种压力来自于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和公立高等教育两方面。

非营利部门通常被称为“第三部门”, 身处公共部门和营利性部门之间并受两者影响。几十年来, 非营利领域受益于公共部门未能满足巨大的增长需求: 私立高等教育占全球入学人数的比例大约飙升至 30%, 其中大部分学生入学于非营利私立院校。

或者, 至少入学人数的大头是在(法律意义上的)非营利院校。事实上, 许多这些非营利院校的功能很像营利性组织。一些文献将这些非营利性组织称为“伪装的营利机构”。法律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和功能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差异, 这不禁令人困

惑。非营利私立院校的概念在美国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接受度高得多。一个重要的非营利原则是: 私人的志愿行动, 其动机不是经济收益——私人所有但目的却是公益。法律意义上的关键在于, 禁止将经济收益分发给所有者或投资者; 如果将财政盈余重新投入高校建设则不会受到谴责。但是, 许多合法的非营利组织擅长寻找道德模糊地带, 将收益转移给他们所控制的企业、他们的家庭或朋友。

人们对营利性高等教育的规模有很多不同的估计。从法律定义来看, 营利性院校只占世界私立高等教育的很小一部分; 也许, 大多数国家甚至没有授予营利性高等教育合法地位。事实上, 许多观察人士怀疑, 在美国以外的国家, 真正的非营利院校远远不只包括宗教附属院校和一些半精英院校。在考虑那些挤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因素时, 分辨哪些是真正的非营利组织、哪些是功能意义上的营利性组织是很值得思考的。

公共部门的加快增长

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公立高等教育长期以来按自然秩序发展。这反过来使随后发展起来的私立高等教育增长更为显著。私立高等教育占入学人数的比例增加之后, 增长势态就一直占主导地位。但进入新世纪后, 由于私立高等教育已经树大根深, 私立高等教育

增加比例的空间就有限了。现在，私立高等教育被公共高等教育挤压的情况已经浮出水面。

在一些国家，私立高等教育事实上已经缩减了。有些是因为激进的政府政策极大地扩展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形式和质量，如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在那些不那么激进的高等教育新兴国家，如哥伦比亚和菲律宾，虽然私立高等教育的绝对入学人数还在继续增长，但是公立高等教育仍然持续扩张。还有一些国家，公立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抵消了私立高等教育份额的进一步增长，如巴西；或减缓了私立高等教育的过快增长，如中国。

公共部门的“入侵”

只有当私立高等教育变得牢不可破，加速公立高等教育的增长才会被视为以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代价。私人企业家反对公进私退。过去他们可能会抱怨（政府愚蠢的规定或学生缺乏政府援助），但仍然会抓紧机会拓展私立高等教育的份额。现在，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公进私退。这种侵犯不仅通过公立高等教育的扩张，公立高等教育还会“师夷长技”，如公立大学变得越来越像企业，从前是低学费和免学费，现在则增开了收费模块。

当整个系统的招生规模不再扩张甚至缩减时，这种挤压就愈发紧张。日本和韩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令招生萎缩，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也将重蹈覆辙。一旦蛋糕份量变小，就会挑起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由于公立机构常常把持局面、收取较低的学费，他们在维持入学人数上很占优势。那些地位相对显赫的私立大学（相当一部分是真正的非营利性大学），尽管它们身处困境，但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竞争、争抢生源。但绝大多数

法律意义上的非营利院校（包括真正的非营利院校和功能意义上的营利性院校）地位很低且易受伤害。

营利性部门的增长

尽管一些法律意义上的营利性院校也受到公立高等教育增长的威胁，但它们在很多地区保持扩张之势。显然，营利的动力、行为和标准也正在不断蔓延。

甚至在招生方面，法律意义上的营利性院校的入学人数也在大幅攀升。从1990年代开始，巴西已经率先在拉丁美洲这样发展了，现在该国五分之一的学生就读于法律意义上的营利性院校。秘鲁和一些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同样允许合法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在智利和墨西哥，只有非营利性大学是合法的。合法的营利性高等教育已经在亚洲遍地开花，现在中国政府已批准营利性院校试运行。

营利性院校的增长为非营利院校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风险。非营利性院校的收费学生越来越少。此外，如果拿巴西作为案例来看，营利性院校的合法化会将现有的非营利院校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政府在授予营利性院校合法地位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那些伪装成非营利性院校但功能上是营利性的院校应该辞去税收减免优惠，并根据利润纳税。这从两个方面威胁了非营利性院校的规模。第一，一些院校会被迫离开这个行业，而一些新的院校会冒出来。第二，合法的非营利性院校将经受越来越多的监管审查。

营利性高等教育是如何步步为营的？

当然，越来越多的监管审查也会让法律意义上的营利性院校过得很艰难。美国国会已经对营利性院校发出了嘘声，并在最近出台措施控制其增长，部分地将生源转移到非

学位教育上。然而，全球没有证据表明监管可以阻止营利性院校（无论其法律意义上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的净增长。通常这些院校要么通过欺骗、要么以不详的方法开发生源。

正如这期特刊中的其他文章所示，利润可以和质量携手并进，至少在职业教育上是如此。事实上，大型营利性企业在这方面具备一些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可以享受跨院校甚至跨国的一些统一的项目带来的规模经

济和功能：（1）高等教育产业化；（2）融资机会，有时还会为了长期受益负担短期损失；（3）当学生需要有效培训时采取顾客导向策略。

因此，非营利部门正受到其他部门不同方式的挤压。这种挤压伴随着传统的非商业性需求和非营利供给的消逝（传统教育的基础是宗教或其他独特的价值观以及对广泛学习价值的信任）。

“质量—利润”假设

Kevin Kinser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奥尔巴尼分校副教授

电子邮箱: kinser@albany.edu

很多对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批评基于一个假设: 质量和利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这种张力通常表现为: 对利润的追求会直接导致质量的下降, 必须用外部监管来避免这种现象, 并明确实施内部保障措施。换句话说, 如果教育机构提供较低质量的教育, 那么其可以创造更大利润。因此, 监管环境是抵御这种可能性的必要堡垒。设置一个质量门槛, 在此门槛之下的私立高等教育将可能失去合法性和来自政府的运营授权。

“利润降低质量”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传统对教育的看法, 即教育是一种利他行为。教育的公益目的历来受到国家在公共领域的支持以及宗教在私人领域的支持。最近几十年, 一群新的教育提供者出现了; 然而, 他们既没有受到国家支持, 也没有成为宗教附属。他们多数只有相当低的质量, 仅仅是满足教育需求而已。校园更像是店面, 学生像客户, 教师持有非主流资格证书, 课程只有最低标准的要求。

因为这些新的私立教育机构主要服务于无法进入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 它们可以向学生收取学费。无论是否是法律意义上的营利性院校, 这种对学费的依赖和运营特征表明其中许多是营利性院校, 甚至是伪装的非营利院校(见特刊中 Daniel C. Levy 的文章)。在任何情况下, 超额的学费收入都表明, 私人部门收取的费用超出其所提供的教育服务成本。与之相比, 公共部门经常支出更高

成本, 收取更低费用, 并在政府补贴上享受不同待遇。

低质量和利润之间的纠结因此而显现出来。低质量的项目是低成本的项目。提供低成本项目, 收取高额的学费, 这样就赚取了利润。因此, 利润来自于低质量项目。随之而来, 由于私立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在赚取利润, 他们的项目质量一定会受到怀疑——这是一个不完美逻辑。仅仅因为低端, 私立院校常常被认为是通过低劣产品营利, 但是质量和利润是可以兼容的。

为什么“质量—利润”假设错了

其他的营利途径并不一定只能依靠低质量的产品。其中, 最为人熟知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教学效率获得额外的资源, 从而降低教育成本。例如增加班级规模、规范课程设置、教授实践课程或通过修改学术日历缩短拿到学位的时间等都能降低教育成本。虽然效率可能是偷工减料的一个委婉说法, 但同样它也是一个减少浪费、让教育活动更有效率的策略。更高效的运营可以为相同数量的学生提供价格较为低廉的教育, 或用同样的成本培养更多的学生。两者的结果都可以让私立教育在不牺牲质量的基础上营利。

第二个途径是提供一些成本相当低廉的课程, 此类课程的标价通常比传统的综合性大学更低(传统的大学将多收的那部分学费用于交叉补贴自己更昂贵的学术项目), 例如私立院校的商业教育项目。这些项目不需要

特殊的工具或实验室设备，专业内容已经固定下来，非专业人士也可以接手。商业教育项目就其本身而言是低成本项目。但许多传统的大学用商业教育项目和其他类似的低成本项目所得的收入支持成本较高的教育项目。私立院校只要不把额外的收入用于弥补亏损项目，就可以不降低质量而获得健康的投资回报。

第三个避免质量—利润此消彼长的策略是减少大学的“臭架子”，不支持那些复杂且昂贵的课外活动，以此守住利润。在美国，营利性院校通常避免建设传统校园里的典型设施——例如体育设施、社团组织、校园建筑。任何主要教学任务之外的设施等都可以被淘汰，只留下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学术项目所必要的设施。那些本来用以支持非学术性特征的收入就可以直接转化成利润，而教育项目的诚信和质量仍然毫发无损。

在这些营利路线中，对学术质量问题的考量只有在第一种情况（提高效率）下才会有争议，而且即使是这样，也只有当传统的课程教学实践是质量供应至关重要的一环才会如此。其他的营利策略利用了整个高等教

育中常见的定价策略。不用牺牲质量、也不必减少教育支出，就能获得额外收入。他们可以提供与公共部门基本相同的教学产品，同时通过减少无关活动支出赚取利润。

质量和标准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大学教育的哪些方面是与质量无关的，哪些又是与高质量学术项目纠缠在一起的？例如，要帮助底子差的学生成功，任何院校都需要把钱花在课堂以外的活动上，比如学术服务、支持、建议、额外的辅导等。教学本身的费用可能不高，但是花在学生身上的费用通常相当高昂。

需要明确的是，一个稳健的监管体制仍然可以服务于质量保障功能。正如美国那样，专门针对营利性高等教育进行监管也许会以营利的名义严重侵犯学术诚信。一些活动当然是非法的，应该禁止。不过，质量保障的目的不仅仅是执行最低标准，还应该讨论“好的和更好的”并追求“最顶尖的”。院校的营利状况可能成为评价教育质量的一个因素，但它不应该成为决定性因素。

美国的国际学生流动

Christine a. Farrugia、Ashley Villarreal

Christine A. Farrugia: 美国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资深研究主管

电子邮箱: cfarrugia@iie.org

Ashley Villarreal: 美国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研究协调员

电子邮箱: avillarreal@iie.org

全球流动学生的数量在过去 10 年中几乎翻了一番,从 2001 年的 210 万增加到 2011 年的 410 万。根据美国《门户开放报告 (2012): 国际教育交流报告》(Open Doors 2012: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2011/12 学年美国接纳了 764 795 名国际学生,比前一年增长了 3.7%。目前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占世界流动学生总数的 19%,而随着大学入学人数的增长外籍学生的比例也在增长。2010/11 学年,美国的出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273 996,比前一年增长了 1.3%,在过去的 10 年增长了 78%。

本文的数据来自《门户开放报告 (2012)》,这份报告统计了 2011/12 学年美国国内的留学生和 2010/11 学年美国的出国留学生情况。

国际学生的增长率

中国连续四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共计 194 029 名学生,继续快速增长 (23.1%)。沙特学生的数量也在继续增长,比上学年增长了 50.4%,达 34 139 名。沙特学生的流动源于沙特政府提供的大量鼓励出国留学的奖学金项目。在未来几年,留学美国的巴西学生数量有望在 2011 年推出的“巴西科学流动计划”(the Brazil Scientific

Mobility Program) 的影响下增长。参与该项目的学生于 2012 年 1 月起留学美国,这将体现在 2013 年的《门户开放报告》中。

相比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由于政府原因推动学生大量增加的国家,一些国家的增长主要源于学生的需求。例如伊朗,虽然伊朗学生面临诸多留学障碍,但是该国近年来留学美国的学生数量保持稳定和显著增长。他们面对的这些限制包括难以获得签证、难以转移资金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以及美国政府对某些科学技术领域的学习限制。在 2011/12 学年,有 6 982 名伊朗学生赴美国留学,较上学年增长 24%,这在过去五年中共增长了 150%。从 1974/75 学年到 1982/83 学年,伊朗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源国,1979/80 学年留美学生多达 51 310 名,但 1998/99 学年又跌至 1 660 名。

在 2011/12 学年,几个大的生源国留美人数有适度的下降。来自印度的学生数量连续第二年降低。在 2011/12 学年,印度学生人数下降了 3.5%,前一学年已下降 1.0%。印度学生人数的下降可能是由于印度国内高等教育的扩张,印度经济的增长给毕业生提供了工作机会,印度卢比大幅贬值等。其它留美学生人数下跌的地区还包括中国台湾地区 (6.3%)、日本 (6.2%)、加拿大 (2.6%) 和

韩国(1.4%)。

国际学生的学术水平

2012年的《开放门户报告》数据反映出不同学术层次的国际学生比例有显著变化。2000/01学年,大学本科生的入学人数首次超过了研究生入学人数,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推动。2011/12学年,中国留美本科生数量达到74 516名,比上一学年增长30.8%。非学历教育这方面,沙特阿拉伯的增长最引人注目,比上学年增长了95%,达到13 214名学生。这些学生中大多数参加的是英语强化项目,随着一些非学历教育学生留在美国开展本科学习,沙特的学历教育将有望持续增长。

在国外学习的美国学生

2010/11学年有273 996名美国学生在国外留学。2010/11学年,美国的出国留学生增长速度放缓,只增加了1.3%,相比之下,前一学年的增长率为3.9%。几个东道主国家发生的事件导致许多海外项目被取消,由此导致前往某些关键求学目的地的入学人数的下降。2011年3月的日本海啸导致33%的减少,同时美国国务院对前往墨西哥的警告导致42%的人数减少。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很可能影响了北非尤其是埃及的留学生数量,前往求学的美国留学生数下降了43%。在同一时期,赴其他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留学人数则大幅增加,包括哥斯达黎加(15.5%)、巴西(12.5%)和韩国(16.4%)。

在过去的20年里,留学目的地越来越多。1989/90学年,76.7%的美国留学生前往欧洲求学,2010/11学年只有一半多一点(54.6%)的学生选择欧洲为求学目的地。2010/11学年,只有21%的美国留学生选择了英语国家,同时很多非英语国家接收的美国

留学生不断增加,包括中国(增长了4.9%)、印度(增长了11.9%)、以色列(增长了9.4%)。这些趋势表明,美国学生的留学目的地越来越具有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全球学生流动

美国的国际学生数量增长背后有两个推拉因素影响学生对留学目的地的选择。美国大学的质量、种类、容量和可获得性都是其吸引国际学生的原因。来自中国的学生看中的就是这些,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和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同样的,来自伊朗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就读于美国的大学,尽管他们面临签证限制和金融壁垒。

然而,以市场为基础解释国际学生流动并不能完全告诉我们推动来美留学人数增长的原因。政府计划送学生出国留学,以加强他们的学术技能,而扩大文化知识会深刻影响国际学生流动,如沙特学生的崛起,背后是2005年开始的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项目(the King Abdullah Scholarship Program)在推动。

同样,美国学生出国留学受到市场力量和政府举措的双重影响。尽管美国学生选择非传统留学目的地部分是由于学生驱动,但也同样受到美国政府对增加留学目的地多样性的影响——比如本杰明·吉尔曼国际奖学金(the Benjamin A. Gilma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该奖学金鼓励学生选择非传统的留学目的地,还有针对中国的“10万强人”计划(the “100 000 Strong” Initiative for China)也促使学生赴中国留学。

增加学生的留学需求意味着国际学生流动将继续增加,但最近一些政府项目的影响表明,政策举措也可以成为增加国际流动性

的强大工具，可以引导学生支持国家利益。

作者注：国际教育研究所发表了《开放门户报告》系列报告，自1919年以来每年发表一份针对美国留学生流动性的报告，1970年代初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

务局（the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的支持。

本文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更多有关《开放门户报告》的信息可在<http://www.iie.org/opendoors>上看到。

中国的孔子学院——更学术化、更综合性

查强

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 qzha@edu.yorku.ca

自从200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诞生第一个孔子学院以来,该计划就一直被视为中国政府扩大中国软实力的一项举措。过去的15年里,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数量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尽管它们在许多民主社会仍有争议,但是到2011年底,108个国家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孔子学堂,其中21%的孔子学院和60%的孔子学堂坐落在美国。毕竟,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背后的组织是隶属中国教育部的“汉办”,受中国政府资助。值得注意的是,仅在2011年汉办就花了1.641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开展各种项目和活动。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还将显著增长。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宣布了三个将在全球开展的主要项目,包括“孔子新汉学计划”——聚焦于孔子学院的研究,在所有孔子学院设置永久学术人员,以及连接孔子学院和所在社区的“中国日”项目。

很显然,这些新项目旨在将孔子学院转型为一个学术单位,将它们融入其所在的大学和所在社区。“孔子新汉学计划”将领衔孔子学院的研究功能。此计划将赞助与孔子学院有关的访问学者在中国开展为期2周到10个月的研究项目,提供博士奖学金,支持举办会议和出版中国研究相关的出版物。核心教师任命计划的目的是在那些运营了两年以上的孔子学院创建永久性的学术职位。核心教师将按照西方标准的讲师或助理教授水平

进行招聘和补贴,“汉办”将负担他们头五年的全部工资和福利和第二个五年50%的工资和福利(其余部分由孔子学院支付)。最后,“中国日”项目(Chinese Day Program)旨在通过定期开展主题活动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以及孔子学院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转型需要研究支持

虽然这些措施能否将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升级仍有待观察,但孔子学院的知名度肯定会攀升(可能伴随更多的争议),并可能将一项新研究纳入议程。新举措的目标与孔子学院的运营现实之间横着许多障碍。首先,孔子学院大部分都是其所在学校的边缘学院,几乎不能承担主流的研究、教学和服务等功能。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在某种方式上与现有结构中的中国研究和中文教学相互竞争,例如那些承载中国相关内容的项目、中心和研究所。孔子学院的外联活动似乎常常与其所在高校的社区参与战略和计划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对接的目标面临重重挑战,需要开展研究以找出恰当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为了对接,孔子学院需要转型,以下问题可能会阻碍其实现转型:孔子学院如何为所在大学的研究功能做贡献?在这方面,孔子学院需要与其所在大学现有的研究结构和议程协同,而不是与他们竞争甚至创建一个新的结构。孔子学院如何为其所在大学的教

学（教学方法改良）做贡献？除了提供中文学习项目和课程，孔子学院可以展示儒家教育传统中人文的那些方面，让它们可以成为其所在大学的教学方法参考，支持其进步。最后，孔子学院如何与其所在大学的社区参与活动对接？怎么能有助于其所在大学的品牌拓展？上述问题可以充实并加强孔子学院的研究发展计划，但是这些有意义的研究不能与其所在大学的学术文化差异太大，或者甚至对立。

孔子学院代表的是一所中国大学和一所外国大学合作办学的关系，这不可避免地汇集了不同的大学文化，有时可能会导致大学文化的“冲突”。例如，汉办现在要求所有孔子学院贯彻战略规划，这些规划常常需要采取三年规划或五年规划的形式。中国的大学已经非常习惯了这种做法。然而，许多与他们合作的西方大学未必能应付这样的要求，因为长期规划并不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学院的规划要怎样才能在这种不重视长期规划的文化下生存呢？即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大学现在适应了规划的文

化，孔子学院规划要与其所在大学的整体规划连通起来还需要细致的努力。

大学文化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合作中存在决策模式的差异。中国大学往往是官僚主义模式（有时是一个政治系统），自上而下，追求短期。相比之下，西方大学更倾向于社团模式，有时甚至被描述为“有组织的混乱”。决策常常来自于共识，这就需要大量的沟通、协商和讨论。问题的关键是要意识到大学文化中的这种差异，并精心培养一个“统一、多样性”的合作——这是儒家的一个理念。总之，孔子学院的转型既包括学术上的努力，也包括对接的努力，不仅需要资源支持，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大学文化的区别以形成“共识”。眼前来看，汉办需要用这些新项目让世界相信，它不是在钻西方大学缺乏汉学和社会科学经费的空子，也不是在试图与其所在大学（这些学校可能深陷财务危机，接受了孔子学院的资金）已有的汉语和中国历史教学角力。也许，中国需要步子慢一点，逐渐获取信任。

加拿大终于制定了国际化的政策

Roopa Desai Trilokekar、Glen A. Jones

Roopa Desai Trilokekar: 加拿大多伦多市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roopat@edu.yorku.ca

Glen A. Jones: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的高等教育政策和评估专业的“安大略研究教席”和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gjones@oise.utoronto.ca

加拿大没有国家级的教育部门、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政策或国际教育的国家战略。此前试图发展国际教育国家战略的努力都已经失败了, 因为省级政府牢固捍卫着宪法赋予的教育责任, 而联邦政府只负责国际关系。在这种背景下,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 2011 年发布宣言, 大致内容为在两年内花 1 000 万加元合计 6 120 万人民币用于开发和推出加拿大的第一个国际教育战略。该宣言迈出了很大胆的一步, 将各利益相关者汇集到一起以建立共同道路。

对国家级战略的需求

国际教育的战略路径对国家在全球竞争的知识经济中实现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国际教育不仅与本国的外交政策关系密切, 还与其他国家政策攸关, 比如贸易、经济发展、劳动、移民、创新和研究等政策。因此, 缺乏相应的国家政策, 使加拿大相继缺乏协调的举措应对这些情况, 且加拿大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加拿大吸引了全球 5% 的高等教育留学生, 远远低于其他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 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

一条新的路径

国际贸易部和国际金融部的部长们共同宣布成立了一个六人专家组, 就如何制定和实施国际教育战略提供建议。2012 年 8 月 14 日, 在广泛咨询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后, 专家组为政府提交了报告。《国际教育: 加拿大未来繁荣的一个关键驱动》(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 Key Driver of Canada's Future Prosperity) 是一份综合性的全面的报告, 围绕五个核心主题提供了 14 点建议。这五个核心主题为: 成功的目标, 政策协调, 可持续的质量保障, 发展加拿大国内教育, 投资、基础设施和相关支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 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教育定义为学生流动, 并强调了一个观点: 学生不应该是单向流动。该战略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是吸引顶尖人才 (在国际上招收最优秀、最聪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并同时鼓励加拿大学生到国外发展全球视角。咨询委员会显然听取了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组织对平衡路线的主张, 它建议加拿大每年通过联邦、省级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资助项目向海外派遣 50 000 名学生。

但报告的大部分集中在国际学生招生和保留上, 这并不出乎意料, 因为扩展加拿大

市场的潜在收入很可观。这份报告建议加拿大将全日制国际学生翻倍，从2011年的239 131人增加到2022年的超过450 000人，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根据这个计划，到2020年，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将占高等教育招生总数的17.3%。这个目标似乎不高，可以实现，因为过去的十年即使没有政府支持和协调，国际招生也一直在增长。招收国际学生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整个报告中被反复强调。国际教育被视为贸易，也被视为满足加拿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个重要“管道”。鉴于加拿大出生率低，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取决于移民，而今天的国际学生很可能成为明天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

改变政策环境

虽然报告紧跟全球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软实力地位的变化。加拿大曾将自己确立为一个非殖民的中间力量，将国际发展援助确立为外交政策的核心。通过建立“加拿大国际发展署”（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加拿大一度是工业化国家中比较慷慨的捐赠者。现在，报告虽然只是稍稍提到，但是已经提出的国家战略将“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确立为国家新战略的领导机构。这确实表明了政策环境的变化。现在的加拿大将国际教育作为经济和贸易利益。往后，它将在与其他

国家的竞争中定位自己，在吸引顶尖人才方面争夺领导地位。该报告建议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国际学生竞争性奖学金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在吸引最优秀的和最聪明学生的道路上走出了积极的一步。然而，它与此前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学生的加拿大奖学金项目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该战略的未来

在加拿大的联邦体制下，怎么协调是试图实现国家战略的关键，也是报告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不过这份报告还是相当关注问题的协调，项目小组试图通过创立为不同的联邦部门提供政策建议的“国际教育和研究委员会”来解决协调问题。新委员会将包括1名主席、3名来自联邦政府部门的副部长以及2名代表省级政府的副部长。这一结构确立了联邦政府在政策领域的领导地位，但很难想象各省会同意参与其中，因为其中不完全包含10个省级的教育部，而且其中一些省已经制定好了省级战略。加拿大的确有机会提高其在国际教育上的分量。然而，它的未来还要依赖联邦政府促进国家与各省有效合作的措施及其兑现国家战略协调的承诺的措施。联邦政府和各省能坚定地站在一起应对加拿大高度分散的体制中固有的治理张力吗？目前还没有针对该咨询报告的官方回应。

海外分校在初创时期的战略选择

David A. Stanfield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的
博士生

电子邮箱: david.stanfield@bc.edu

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外建立分校时面临各种各样的战略决策。十年前, 几乎没有什么决策指导。现在, 先行者的经验已经在为下一代大学考虑各种选择提供帮助。本文概述了可能影响成功与否的三种决策。

探路先驱 VS 成熟市场

人们说,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但是同时也说, 第二只老鼠才会得到奶酪。第一个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国大学可以在初期受益。这就是所谓的先发优势——这个概念在商业界为人所熟知, 凭借先发优势, 一个公司通过早早进入一个特定的市场建立起主导地位。虽然这些“先到的”国际分校还必须与当地高校和传统留学项目相竞争, 但相对于“后到的”大学, 它们也经常具备一些优势。

通过提前在当地社区建立积极声誉, 先到的院校能够获得长期优势, 这明显有利于接下来几年的招生。伍伦贡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在澳大利亚以外并不出名, 但它是第一个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建立分校的大学。学校建设速度很快, 尽管后来有 20 多个分校进入当地, 该校还是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招生人数。

还有一些大学选择进入已经被其它大学开辟了的市场。这种情况下, 外国教育提供者的被需求度和接受度都存在更多的确定

性。然而, 决策需要优秀的研究和规划来指导。例如, 院校必须估计学位项目的需求, 评估院校在目标学生中的声誉, 考虑东道国的法规是否和自己的长期愿景一致。此外, 当进入迪拜或新加坡这样的成熟市场时, 院校管理者必须确定学校所在地的教育市场对该类型的院校、学位或教育方式的需求是否已经饱和。

综合型 VS 聚焦型

有少量外国教育提供者建立的分校是综合性的: 学校提供多样化的学术项目和课程, 行政架构稳定, 基础设施齐全。此外, 学校还倾向于提供更广泛的校园服务和课余课程。教育提供者通常希望此举有助于提供与主校区相似的校园风气和学生体验。更广泛的课程让综合性的分校成为对主校区学生有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

综合性院校如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New York University in Abu Dhabi) 和诺丁汉大学中国校区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都严重依赖其全球品牌来吸引学生。在这种模式下, 非名牌院校可能难以招到足够的学生。创建一个综合性院校很昂贵、很复杂, 通常需要多年的先期计划以及一个较长的启动阶段。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院校可能面临声誉和财政损失, 这不仅会影响分校还会波及主校区。

其他的国际分校可能关注点更狭窄，它们只提供有限数量的项目，有时只是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酒店管理学位。它们倾向于提供当地院校不能提供、或者能提供但质量不高或供给不足的学位。从战略角度看，相比于综合性院校，这种学校要估测学位的需求量就没有那么复杂。此外，较低的启动成本和更少的人力需求能加快进程，降低风险。即使需要额外的课程，只要在原先课程的基础上再加一些就行了。

合作 VS 单干

迪拜、马来西亚、卡塔尔、新加坡、韩国和其他国家地区都在发展教育中心，集中办国际分校。一些教育中心提供院校合作机会。加入这样的教育中心可以帮助分校省钱，缩减启动时间，通过共享设施和学生服务（如宿舍楼、餐厅、图书馆和诊所等）减少麻烦，虽然不同的中心合作程度不同。然而，合作可能减少院校的控制力，并在一些标准和期望上有所妥协。那些希望保持严格质量控制或试图复制主校区特定元素的院校可能会欢迎更加自主的方式。院校合作或自治的程度受到其他院校的物理距离以及东道国或当地合作伙伴正式和非正式期望的影响。

卡塔尔教育中心的六所美国大学允许学生在院校之间交叉注册课程，这能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选择。促进交叉注册对那些需要提供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的本科院校特别有益，这些学校如果学生数少就很难维持。在一个教育中心建立分校也许还能通过联合品牌和招生提高宣传机会。

密切合作的缺点是招生竞争和其他资源竞争。此外，建立合作协议（如交叉注册或共享学生服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需要数年的谈判，之后还要不断调整。例如，卡塔尔教育城在启动阶段时，当地赞助建造了一幢人文科学大楼，出发点是假设分校学生可以分享通识教育课程。但随着各个大学加入该计划，各个大学有自己独特的通识教育需求，这让当初的假设变得不切实际，甚至无法实现。

结论

随着分校的发展，学到的经验和历史的视角增加了新进入者成功的机会。思考上述问题将帮助大学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每个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院校必须谨记，这些战略决策像所有其他决策一样应该根据院校独特的目标和东道国的环境来制定。如果一些决策者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有些决策就有失败的风险。同时也存在有些院校没有决策权的情况。例如，一些决策可能完全由当地法规或合作条款来决定。在现实中，建立一个分校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可以帮助学校取得短期和长期的成功。

注：IHE 每期都会刊出一篇来自跨境教育研究团队（C-BERT，总部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文章。更多关于 C-BERT 的信息请点击 www.globalhighered.org，Twitter 上请关注 @CrossBorderHE。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绽放新活力

José Joaquín Brunner

智利圣地亚哥迭戈波塔利斯大学 (the Universidad Diego Portales) 教授, 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高等教育政策比较领域的负责人

电子邮箱: josejoaquin.brunner@gmail.com

1950年, 拉丁美洲只有75所高等教育机构, 其中多数是大学, 在校生26.6万名。今天, 拉丁美洲大约有3900所大学和10500所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校生2000万。此外, 20世纪60年代适龄(18~24岁)青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2%, 2010年达到37%。换句话说, 拉美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 将少数人专属和精英主义观念抛之脑后; 而在阿根廷、智利、古巴、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适龄青年的毛入学率也已超过50%。这种显著性的转变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 教育、社会和公共政策面对的挑战迫在眉睫。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特征

在拉丁美洲, 高等教育的版图和国家体制都呈现无序和混乱的情形。多样性是主要现状。院校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规模, 覆盖不同的学科领域; 学生群体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文化资本; 教师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劳动制度、培训风格和教学模式; 学术分工多样; 院校治理和管理、资金来源和功能安排有不同的形式; 院校与社会、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关系密切。这些系统具有后现代的所有特性——混合型机构,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文化共存,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共生, 知识流动, 占主导地位的是短期项目、

市场力量和缺乏宏大叙事等。

事实上,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快速大众化离不开全球资本主义浪潮。该浪潮的特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多元网络化和知识强化。拉丁美洲的劳动力教育程度低, 其经济活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中等教育以上。很快, 一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将达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秩序的原则

我们的高等教育真的这样混乱吗? 这是由于缺乏秩序、协调和领导吗? 我不这么认为。相反, 在表象之外, 人们可以辨别体制背后的结构以及协调和领导的特定模式(不同于指挥和控制, 它们并没有充分设计)。

根据国际公认的资产、控制和资金来源, 高等院校可以分成三类: 公立/国立高等教育机构;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其所有权、控制权和资金掌握在个人或私企手中, 并不直接接受国家补贴; 在这两个类型之间的第三类是部分或完全接受国家税收但具有私立治理结构的私立院校。生源分布和公共/私人经费来源形成了现有的秩序。这两个参数定义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政治经济。

今天, 超过一半的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在校生都就读于私立院校——它们没有直接的政府或公共定期补贴, 大约35%的高等教育

支来自私营资源。在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巴拉圭和秘鲁，私立院校的招生和经费都高于本地区的平均水平，在某些情况下达到50%。国家和私立中介机构的联合促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今天的拉丁美洲地区，私立院校有最高的入学率，最大的经费也来自私人——特别是家庭和学生债务。

国家体制的领导和协调与政治经济相一致，建立在市场竞争、政府监管和机构的战略行为之上，本身就产生于竞争和监管。即使存在引导，也与院校保持距离，政府通过法规、激励和信息参与管制；同时，院校基于其在特定系统中的地位，竞争生源、学术人员、资源和声望。简言之，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如此混乱是市场条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政府框架的虚弱或无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充其量只提供了法规、评估和激励（补贴）方面的指引而没有实施控制。

挑战

鉴于拉丁美洲已经存在的这些情况，政府的首要责任应该是引导市场为社会福利做出努力，并将市场发展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该建立一个框架，规定优先事项、基准和方法。协议应建立在规则之上，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院校要具备调节系统和控制中介行为的能力；要清晰和负责任的报告相关要求；为高等教育提供国家资金数量和模式的中长期指导方针和信息。

公共部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确保质量。在拉丁美洲，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样的活动会降低市场的协调功能，质量的最好指标是院校排名。面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公共部门需要承认，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

高等教育市场常常产生“军备竞赛”、鼓励持续增加成本，并对公共财政和家庭/学生收入施压。（给予院校和学生的）政府补贴分配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优先次序，并使用大量精细的资源配置工具，如竞争性经费、绩效协议、公式等方式，以此促进内部和外部效率、刺激创新和改进质量。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人的能力建设，这牵涉很多问题，例如：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录取规则，如何选择不同的机构；能力评定；课程理念和组织；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师资队伍；从高等教育向工作岗位的过渡，以及跟进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等问题。每一个方面都应该考虑院校的多元化，包括大学和非大学的机构、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精英院校和普通院校，等等。挑战是多方面的，以下内容只简单列举几个主要特点。

入学机会的关键问题是估量教育大众化的后果。特别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较差的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五分之三以下的阶层）。国际学生评估测试表明，年轻人中很大比例有待开发，中学的最低技能要求包括阅读理解、算数、应用科学原理讨论问题和使用证据。他们往往没有自学能力，而这却是高等教育要取得成功的基本要求。高校将不得不弥补这些缺陷，而不仅仅是为学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如果不这样，该地区的辍学率预计达到50%，这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严重的人才和资源浪费（包括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

面对大规模的培训需求，（受政府鼓励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改善（那些被广泛认为僵化平庸的）课程和过早的专业化倾向，以培养组织工作和沟通新方式所要求的社会素质。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将与数字化学习和

继续教育相结合，从而影响教师的培训和教学模式。

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需要强调：就业能力是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不应丢弃其他关键方面的学习，比如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个人的职业生涯管理、多元包容以及文化多样性等。

总而言之，拉美地区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发展创新的概念和工具应对教育大众化的挑战。此外，这些挑战发生于混合经济体制中。在这个体制中，政府、市场和院校互动并进行新的安排，以应对社会需求和抱负，从而减少贫困、专制、暴力和不平等。

阿根廷的公立大学：既无效率又无效果？

Marcelo Rabossi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 (Torcuato Di Tella University) 政府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mrabossi@utdt.edu

在总统胡安·多明戈·贝隆 (Juan Domingo Perón) 的任期内 (1946~1955年)，阿根廷在所有公立大学实施了开放招生政策：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入学。此外，学费全免。这种全免费教育让入学人数激增。虽然这两项措施相继暂停，特别是新的军政府上台之后，但这一模式最终在1984年被固定下来，并决定了今天的学生流动。不出所料，这个开放政策也有其阴暗的一面。惊人的消耗率和低毕业率显示出公立大学的低效率和低效果。

一个低门槛的机制

今天，54所国立大学招收了近140万学生 (2010年的入学率是79.5%)，每个大学都可以自由决定招生过程。由于每所大学的特点和需求不同，形成了不同种类的补习课程，几乎所有中学毕业生都参加补习班。因此，在这种逻辑的指引下，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经济上，考生不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就能进入最有声望的国立大学。换句话说，不管他们的学业成绩如何，都可以进入任何一所公立大学和任何一个心仪的研究领域。然而，这种宽松的招生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鉴于阿根廷缺乏高中毕业标准和一般的期末考试来做质量控制，因此需要考虑开放入学模式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下，该体制

面临额外的压力，特别是当普通高中缺乏成功完成高等教育所需的技能时。根据最新的《国际学生评估》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项目，2009年阿根廷在65个国家中排名第58，这表明该国成绩最差和最好的学生之间的差距是参与评估的国家中最大的之一。所以，也难怪只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完成大学教育了。

一所无效率、无效果的大学

平均而言，只有22%的学生在国立大学完成学位。相比之下，私立院校的毕业率更高 (35%)。私立院校更高的机会成本和组织有效的研究课程都鼓励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位。但在公立院校，对内部法规的忽视或不遵守也可能是问题的原因之一。尽管199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 (the Higher Education Law) 规定，所有学生每年必须完成至少两门课程以继续学业，但事实上，可能有27%的学生在一个学年内一门课都完不成，而完不成两门课的学生比例则增加到41%。难怪这种“宽容的大学”让阿根廷的毛入学率在拉丁美洲最高了。另一方面，该国每1000名居民中只有2.4名毕业生，远低于该地区内更高效的体制。

尽管部分公立大学的毕业率堪与国际标准 (大约50%的新生完成了他们的大学教育)

相比,但其他大学的低毕业率就令人担忧了。实际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公立大学的学生退学率在80%以上。这种不均衡很可能是因为一些院校对人才需求较大的专业的招生更具选拔性。通过将成绩差的学生分配到对学术要求较少的专业,一些大学已经能够减少辍学学生的人数。此外,一些补习课程已被证明有效,特别是在较小的班级中,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和导师接触。此外,一些公立院校正在扩大短期项目的数量,以增加毕业生人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表现得像非大学的机构,以达到解决辍学困境的目的。

部分解决方案:有效的非大学机构

相比之下,现在非大学的机构中学生比例不断上升,这一现象缓解了全国毕业率低的情况。这些院校在网络技术和技术教育等领域提供两年制或三年制的项目。同时,超过70%的中小学教师从这些院校毕业。这些院校也被证明比国立大学更有效率。

这些高校招收了69.1万名学生,只占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的30%,但毕业生人数却和大学一样多。实际上阿根廷的这些院校在生产人力资本上更有效率,有效地将阿根廷的高等教育毕业率提升到与邻近国家齐平的

地位。

高等院校更高的效率建立在学术和组织两个因素的基础上。首先,学术项目时间更短,对学术准备的要求更少。第二,通过更小的班级规模,这些院校促进了学生和教授之间更为密切的互动。同时,高等院校被设计为中学的拓展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提供了一个“友好的环境”,只需要做稍许的调整就能成功。

结论

虽然阿根廷的国立大学以自身的招生公平为傲,但其人力资本生产也被证明低效率(以高退学率判断)和低/无效果(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毕业率低)。即使没有招生要求和学费问题,大多数学位项目,从第一年至后续几年的选拔性都很高。如果阿根廷想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目标,就必须重新制定高等教育政策。除了迫切需要改革中等教育,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学习培养学生之外,高等院校和大学必须作为互补的实体。必须改善两种类型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几乎做不到),才能帮助学生从中等教育平稳过渡到高等教育,并且给学生更多的选择。

中美洲：国际学术合作的价值

Nanette Svenson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杜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 “佩森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Pay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nanette.svenson@gmail.com

中美洲和许多小型发展中地区一样，对全世界的工作几乎没什么贡献。它占全球研发的比例不到 0.05%，仅占有收录在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出版物的 0.07%。虽然这似乎让中美洲科技进步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恰恰相反的是，该方向的发展将很可能决定该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之间有七个国家：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虽然国与国之间差异显著，但都属于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定义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所以尽管贫困率达 40%，然而中美洲还没有穷到符合大多数捐助条件。该地区却也没有足够大或富足到可以靠内部力量推动国家的科学发展。有趣的是，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和该地区属同一类别，这些国家的数量比高收入或低收入国家的数量多了一倍。因此，中美洲要面对的情况并不特殊，特别是在参与全球科学探索这方面。国际学术合作为解决这一问题和弥补一些现有缺口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

障碍

在发展研究能力方面，中美洲面临众多挑战。最近几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有所增长，这主要归功于私立大学和各种劳动力

市场金融激励的繁荣，现在适龄人口的入学率平均达到 25% 左右；但据估计，毕业率低低于该比例的一半。除了哥斯达黎加以外，其他国家的教育质量都存在问题。中美洲没有一所大学出现在国际排名中；这些国家公共教育投入也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成员国公共教育投入占 GDP 比例的平均值 5%；几乎没有教授拥有高等学位；质量保障机制也才刚开始发展，仍不发达；并且学校提供的课程一般都是过时的，过于理论，并不适用于生产部门的工作。

此外，该地区几乎对科学研究不投入资金。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相比，70% 的科研投入来自公共部门，几乎没有私人资金。政府勉强对基础医疗和教育腾出一定的预算，而对科技活动的投入则要少得多，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制约因素。因此，研究被视为奢侈品，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们对其潜在回报的意见都差不多，中美洲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少的地区之一。此外，中美洲还缺乏制度化的努力，这就阻碍了科学规划的可持续性。最后，该地区的工作语言主要为西班牙语，这可以促进拉丁美洲国家间的合作，却阻碍了与北美、欧洲、大洋洲和亚洲间的合作，而目前大部分的科学探索和成果出版都出自这些地区。

虽然存在这些障碍，但是中美洲确实可

以为全球科学界做出一些贡献。它的自然资源、本土传统和历史迁徙的重要性以及其他特点都让这一地区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它毗邻北美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基础都有助于建立一个操作平台。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基础也有助于提供一个操作平台。下一步是利用这些资产将发展重要的科学能力作为教育的焦点。

前途有望的建设计划

国际学术合作可以增加科研预算并增进科研能力。事实上，目前中美洲的科研开销中，国际资金所占比例约为20%。在这方面，最有希望发展的部分之一是跨境大学和研究型机构领导的项目。其中有许多项目已经开展了几十年，正开始进入红利收益时期。特别是，围绕地区共同利益的相关领域（如农业、环境管理和健康医疗），集体协同效应也已经发展起来了。

位于哥斯达黎加的热带农业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the Tropic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Center）就是一个例子。该中心依托成立于60多年前的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the Inter-American Institute of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而建立，目前受到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捐助者的支持。热带农业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是一个地区性的研究和教育中心，专注于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方向。研究所已经有2000多名毕业生，拥有100多个研究项目，其教授和研究人员来自25个国家，已以西班牙语和英语发表大量研究成果。

其他类似的例子包括位于巴拿马的美国史密森尼热带研究所（the US 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位于哥斯达黎加

的联合国和平大学（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for Peace）；位于危地马拉的中美洲、巴拿马泛美医疗组织营养研究所（the Pan-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Institute of Nutrition for Central America and Panama）；以及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支持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the Latin Americ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该项目覆盖了整个地区，包括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巴拿马。这些建设计划都有利于建设对中美发展尤为重要的重要的区域中心，以发展专业知识、教育、研究和创新。只要该地区能利用国际科学研究的能力和资金以及吸引区域行动者和学生，这些中美国家就能继续推进该地区的知识转移。

今后发展

中美洲地区和各国国家层面的政府必须更持续有效地推动这些建设计划。强化国家实体为科学创新担负起责任是十分必要的，它们目前也正在改善监控和评价方法以为进行中的科学活动统计数据。哥斯达黎加在这方面走得最远，其次是巴拿马和危地马拉，但所有国家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同样重要的还有：为具体的科学和技术能力开发制定战略目标，以及将发展目标与科学能力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这能帮助更好的识别优先事项和分配资源。

中美洲的大学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促进这一进程。即使资源有限，将研究生学习课程与更体现弗拉斯卡蒂原则（Frascati principles，被用作全球基准）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加强英语技能也是重要补充。这两个行动都

将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为寻求和参与国际研究合作做准备。鼓励与上述类似的更多类型的国际学术合作项目不仅会刺激该地区的学术学习，还能给大学增加向政府争取更多研究预算的砝码。

发展中美洲的科学技术能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资源和模式都是可以得到的，

一些区域也正在取得进展。应该不断发展并扩大这些进步。更好的利用国际科研和技术能力、进一步推进区域发展目标将让中美洲国家大大受益。这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地区面临类似挑战的中等收入国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墨西哥：入学竞争、院校评鉴、私立—公立大学市场

Juan Carlos Silas Casillas

墨西哥大学瓜达拉哈拉耶稣会大学 (the Guadalajara Jesuit University) 教授

电子邮箱: silasjc@iteso.mx

墨西哥的私立高等教育和院校多元化历经了几十年的大力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局势更加复杂。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部门之间不断变化的格局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尤其是紧张的招生市场竞争。

评鉴作为机构合法性的标识地位不断上升，因为评鉴由独立机构开展，基于预设的评鉴步骤，强调专业的凝聚力或学术结构的稳固。评鉴被认为是质量的同义词。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及其相应的评鉴作用，正在系统的主要范围（公立院校和中档私立院校）里蔓延开来。院校必须在巨大的压力下竞争可录取学生人数。但这不包括精英院校，它们总是有巨大需求，吸引着最优秀的候选人，并不需要更多的合法性。同时，“需求吸收型”的院校（即只依赖需求的院校）继续超出优质高等教育供给。因此，这些院校几乎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招到相关学生。但是公立院校和中档私立院校的确不得不为招生而奋斗，而它们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类院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较低的中产阶级，常常是（家庭中）第一代或第二代大学生，几乎总是高度渴望就业。私立和公立院校都在对同一群生源展开竞争。

这种令人意外的激烈竞争状态似乎源于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教育部加强了质量保障工作。就如其他国家一样，几十年来，随着招生人数的快速增长以及院校和专业的扩大，政府已经加大了对最低学术标准的关注。

政府意识到，政府所青睐的市场活力需要规范监督。另一个因素是消费者驱动的期待的增加。本科生及其家庭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能仅仅依赖院校提供可以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凑效的学习体验和学位项目。评鉴工作是对来自政府和生源的双重压力的逻辑回应。

令人迷惑的教育项目全景

不断加重的消费者焦虑加剧了教育项目发展的迷惑。无论是教育项目数量，还是在诸多项目中做出判断，都有同样的问题。招生数据和本科院校课程项目的数据都显示：尽管公立和私立院校的资金筹措和基础设施有明显差别，但是它们中的大部分学校在课程和招生方面都有许多相似性。那些教育项目倾向于为经济服务，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学毕业生。

公立大学也争夺市场份额并以工作为导向招生，这似乎违反常理。毕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传统观点认为，公立院校担负着培养不同知识领域的专业人士的任务，以此满足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竞争和广告并不是这一观念的核心。公立院校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对传统课程改名，并努力展示专业内容和教育方式的创新性呢？主要原因是中档私立院校的挑战。声誉卓著的公立院校如墨西哥索诺拉州的索诺拉技术大学（ITSON），在报纸上做广告；位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

大型州立大学（瓜达拉哈拉大学）在商场里设立了问询处。不只是私立、创业型的院校会在招生会和商业中心里分发小礼物。

评鉴和市场

这种教育项目提供方式和广告影响了许多学生和家庭。信息爆炸令那些急切寻找择校合理依据的人困惑。在这种背景下，家庭基于三个元素（除地理位置之外）做出求学决定：（1）学校的市场形象、宣传册、媒体和其他营销表现；（2）学费；（3）评鉴，它是质量的标识和合法性的因素。

第三个元素评鉴在令人疑惑的环境中似乎至关重要，因为教育部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角色，即从入学机会的提供者变为谴责低绩效、奖励高绩效的评估者。教育部已经将质量列为主要目标，而评鉴作为检验质量的可信方式也已经奠定了地位（至少院校都在为之奋斗）。可想而知，公立院校和中档私立院校都参与了这一“评鉴竞争”——公立院校是为了证明他们持续的价值，私立院校是为了展示它们的可靠性。聚焦于优秀学生的精

英院校也寻求评鉴，但主要不是为了市场营销战略；评鉴不是（或不能是）“需求吸收型”院校的主要目标。

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似乎很重视评鉴的作用——不仅为了获得更高的绩效，还为了显示它们从外部权威获得了合法性。但是，评鉴步骤并不清晰。无论是院校还是教育项目都可以寻求评鉴，评鉴机构多种多样：美国的评鉴中介、国家私立院校联盟、国内大学协会，以及一批专业协会。院校可以通过将基本质量或营销手段与说服力进行不同程度的混合来获得评鉴，也可以通过复制已评鉴课程或专利来获得认证。这些院校不能忽略日益剧增的市场压力，否则它们就不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公立—私立大学市场上把自己推销出去。

注：《国际高等教育》发表出自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的一些文章。该项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参见 <http://www.albany.edu/>。

新书速递

Adamson, Bob, Jon Nixon, and Feng Su, eds. *The Reorien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ing the East-West Dichotomy*.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Univ. of Hong Kong, 2012. 324pp. (pb). ISBN 978-988-1785-27-5. Web site: www.fe.hku.hk/cerc.

本书是一个论文大合集，涉及全球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寻求将国际趋势与区域和地区挑战联系在一起。讨论的主题包括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动力、印度改革的困境、香港的区域和全球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层面以及中亚的合作等。

Agarwal, Pawan, ed. *A Half-Century of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Essays by Philip G. Altbach*. New Delhi: Sage, 2012. 636pp. INR995 (hb). ISBN 978-81-321-1048-4. Web site: www.sagepublications.com.

本书反思和讨论了印度高等教育过去半个世纪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主题包括学生的政治活动、高等教育改革、大学政治、学术职业、语言和高等教育以及南亚的知识分布等等。

Albornoz, Orlando. *Competitividad y solidaridad: Las tendencias de la universidad contemporánea*. Caracas, Venezuela: Universidad Católica Cecilio Acosta. 560pp. (pb). ISBN 978-980-405-001-5.

本书包括前言、序言、六章正文和结语，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及其在社会上

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展开了评论。作者批评了当代委内瑞拉高等教育诸多特点中的“学术的民粹主义”(academic populism, Albornoz于2005年发明了这一概念)。“学术的民粹主义”诱发了许多决策，影响了整个系统。他提出，尽管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现在称为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试图将竞争和团结这两个概念对立，但其他社会主义社会(如中国，书中的一个章节审视了这个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协调了这两个概念。该书对以下主题展开了社会学概述：委内瑞拉高等教育的未来，政治冲突中教育、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作用，高等教育系统影响改革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委内瑞拉是否可以以及是否应该试图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Iván F. Pacheco)

Altbach, Philip G., Gregory Androushchak, Yaroslav Kuzminov, Maria Yudkevich, and Liz Reisberg, eds. *The Global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BRIC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3. 206pp. \$85 (hb). ISBN: 978-0-230-36978-8. Web site: www.palgrave.com.

这本书聚焦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美国的学术职业，讨论了高等教育体制中的职业道路、薪水以及学者的地位。引言所在的章节比较了金砖四国，评述了各自具体的优势和弱点。

Anderson, Melissa S., and Nicholas H.

Steneck, ed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Much to be Gained, Many Ways to Get in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96pp. (pb). ISBN 978-0-415-53032-3.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收集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科研合作的可能性和问题的文章。涉及的主题包括国家科学研究组织的不同类型，国际背景下的科研诚信，美国法律对国际研究项目的影 响，博士教育的差异等。

Arkoudis, Sophie, Chi Baik, and Sara Richardson. *English Language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Camberwell, Vic., Australia: ACER Press, 2012. 186pp. \$44.95 (pb). ISBN 978-1-74286-064-0. Web site: www.acerpress.cin.au.

本书认为英语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国际语言，提供了在全球多种学术环境下使用英语的实用指南。讨论的主题包括英语学习项目的模式、课程设计和评估、英语水平和工作准备等。

Ashcroft, Kate, and Philip Rayner.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Sub-Saharan Africa*.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ers, 2011. 286pp. (pb). ISBN 978-1-41735-541-7. Web site: www.infoagepub.com.

本书的重点是如何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学，讨论了非洲高等教育的背景。其它几章涉及课程开发、质量和标准、教学、研究、学生服务等主题。该书用相关的小案例研究阐明了大观点。

Bastedo, Michael N., ed. *The Orga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ing Colleges for New Er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2. 366pp. (pb). ISBN 978-1-4214-0448-6.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收录了一些广泛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组织的文章。书中分析了高等教育组织研究的趋势，讨论了多样性、排名、社会运动和大学、制度策略、中介理论和组织等主题。

Cooper, David. *The University in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of Use-Oriented Research*. Cape Town: Human Sciences Press, 2011. 390pp. (pb). ISBN 978-0-7969-2347-9. Web site: www.hsrcpress.ac.za.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研究发展与产学合作的国际模式。第二部分聚焦于南非，提供了几所大学和实验室的案例研究，以说明大学怎样参与开发过程。该书提供了对问题的细致分析。

Deardorf, Darla, Hans de Wit, John D. Heyl, and Tony Adam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Los Angeles: SAGE, 2012. 536pp. (hb). \$125. Web site: www.sagepub.com.

这本卓越的书为学者、管理者、决策者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国际高等教育资源。手册全面覆盖了这一膨胀的、日渐增长的领域，包括历史回顾、学生和学者流动的当前趋势和方式、跨境合作的创新方式以及教学国际化的努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专家在美国高等教育背景和全球背景下审视了国际化的趋势。该书提供了一个对建立战略反应有价值的概念背景和实践指导，并一探国际高等教育的未来。(David A. Stanfield & Yukiko Shimmi)

Fegel, Daniel Mark, and Elizabeth Mlson-Huddle, eds. *Precipice or Crossroads? Where America's Great Public Universities Stand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Albany, 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2012. 318pp. \$24.95 (pb). ISBN 978-1-4384-4492-5.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为了纪念《莫里尔法案》(the Morrill Act) 200周年(该法律在美国创建了赠地大学), 本书反思了美国公立大学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前景。讨论的主题包括赠地遗产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增强公共目的和公共高等教育成就、公共资助和学费、全州大学系统和土地出让的想法以及公立研究型大学未来的前途。作者中有几位来自重点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

Kelly, Andrew P., and Mark Schneider, eds. *Getting to Graduation: The Completion Agenda i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2. 335pp. (hb). ISBN 978-1-4214-0622-0.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学位完成率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最有争议的主题。这本书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许多主题, 焦点是提高学位完成率所面临的挑战, 经济援助与学位完成率, 学徒制和学位完成率, 社区学院、证书课程、补习和学位完成率的角色等等。该书可能是针对这一问题最全面的概述。

Kościelniak, Cezary, and Jaroslaw Makowski, eds. *Freedom, Equality, University*. Warsaw, Poland: Civil Institute, 2012. 296pp. (pb). ISBN 978-83-933794-4-6.

本书关注欧洲大学面临的关键挑战, 广

泛涉及入学机会问题、学生的积极性和非暴力不合作、市场和民主等问题。这些章节都伴随着有关俄罗斯、英国、芬兰、德国、意大利政策变化的相关案例。

Kwiek, Marek.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States, Markets, and Academic Entrepreneurialism*.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Peter Lang, 2013. 486pp. (hb). ISBN 978-3-631-62403-6. Web site: www.peterlang.de.

本书分析了欧洲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讨论了扩大私立院校、改变欧洲国家的社会契约和高等教育思想、大学和福利国家、知识交流以及学术创业精神。

Kwiek, Marek, and Peter Maassen, eds.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 a European Context: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Poland and Norway*.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Peter Lang, 2012. 242pp. (hb). ISBN 978-3-631-63808-8. Web site: www.peterlang.de.

本书的重点是被编辑们称为“欧洲外围国家”即波兰和挪威的发展。这两个国家被该书的编辑置于更广泛的欧洲背景下。其他章节审视了波兰的公立、私立院校的动力, 两个国家的学位框架和两国的欧洲化等。

Lane, Jason E., and D. Bruce Johnstone, ed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Economic Drivers: Measuring Higher Educatio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2. 316pp. \$24.95 (pb). ISBN 978-1-4384-4500-7. Web site: www.sunypress.edu.

该书主要关注美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探讨了高等教育和经济竞争力、评估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的问题等类似主题。还关注了社区学院在经济发展中对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Levin, John S., and Susan T. Kater, eds.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Colleg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63pp. (pb). ISBN 978-0-415-88127-2.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讨论了有关美国社区学院多个层面的重要议题,聚焦于社区学院的历史、成人学生发展、对学术准备不足的学生的教学、社区学院的管理和领导、经济和劳动力发展、国家财政支持等。

Mack, Arien, e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me issue of *Social Research* 79 (Fall, 2012): 551-784. \$18 (pb). ISBN 978-1-93348130-2.

本书收纳的论文聚焦于全球高等教育的未来,包括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和研究型大学结构重组。文章具体涉及研究型大学的财政未来、中国大学的未来前景、教育成果和考试、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趋势等。

O'Hara, Sabine, ed.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Equity, Access, Opportun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162pp. (pb). ISBN 978-0-87206-34-1. Web site: www.iiebooks.org.

本书精选了有关非洲高等教育的文章,主题包括非洲入学机会改进、高等教育的公共和社会效益、私人融资、性别不平等和其它高等教育问题。

Palmer, John D., Amy Roberts, Young Ha Cho, and Gregory S. Ching, e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1. 230pp. \$85 (hb). ISBN 978-0-23010-932-2. Web site: www.palgrave.com.

本书广泛考察了东亚国际化问题,比较了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中心、韩国的国际化和美国化、中国地区性大学的国际化问题、日本和韩国的英语化和国际化等等。

St. John, Edward P., Nathan Daun-Barnett, and Karen M. Moronski-Chapman.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raming Strategies for Preparation, Access, and College Succ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321pp. (pb). ISBN 978-0-415-89356-5.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是《高等教育核心理念》系列丛书的最新成果,旨在提供美国高等教育课程概述;该书以文本为主,包含案例研究和学生练习。书中讨论了入学机会和大学成功有关的美国政策辩论,聚焦于特定政策而不是广泛的政策问题。国家政策话语和案例研究也专注于国家层面。

Shattock, Michael. *Making Policy in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1945-2011*.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80pp. £37.99 (pb). ISBN 978-0-335-24186-6. Web site: www.open.co.uk.

本书是针对英国高等教育政策半个世纪以来的变革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永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本质)的经典论述。英国的体制结构、财务问题、政治、问责运动、不断

变化的政治风向等都被结合在一起，受到精细的分析。

Tight, Malcolm. *Researching Higher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8pp. (pb). ISBN 978-0-335524183-9. Web site: www.open.co.uk.

这是一本聚焦英国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全面指南。本书讨论了相关领域最重要的书籍和期刊、关键问题研究（如学生体验、质量、系统开发、学术工作等）以及做研究的过程（如研究方法）。

Trower, Cathy Ann. *Success on the Tenure Track: Five Keys to Faculty Job Satisf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2. 270pp. \$45 (hb). ISBN 978-1-4214-0597-1.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基于哈佛大学《高等教育学术职业协作》收集的一系列美国大学的数据，本书提供了针对早期职业发展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报告。讨论的主题包括终身教职的挑战、工作生活一体化、教学和研究支持、共同治理和和校园社区等。

Vande Berg, Michael, R. Michael Paige,

and Kris Hemming Lou, eds. *Student Learning Abroad: What Our Students are Learning, What They're Not,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Herndon, VA: Stylus, 2012. 454pp. \$39.95 (pb). ISBN 978-1-57922-714-2.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

本书主要关注出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特别关注学生的海外学习经历。涉及的主题包括学生海外留学体验最大化、跨文化学习、创建社群、国外的教育和学习、跨文化交流等。

Wang, Qi, Ying Cheng, and Nian Cai Liu, eds.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 Shared Goal*. Rotterdam, Netherlands, 2012. 216pp. \$49 (pb). ISBN 978-9462-09-032-3.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本书源于201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一流大学会议，聚焦于一系列有关研究型大学发展和争取世界一流地位的观点。讨论的主题包括打造世界一流的不同道路、排名和分类、亚洲顶级研究人员、网络对世界一流地位的影响等。书中还收录了来自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台湾和荷兰的案例研究。

